

高瑞泉作品系列

动  
力  
与  
秩  
序



中国哲学的  
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

高瑞泉 著

· 高瑞泉作品系列 ·

# 动力与秩序

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  
(1895-1995)

高瑞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 / 高瑞泉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1

(高瑞泉作品系列)

ISBN 978 - 7 - 5495 - 9333 - 0

I. ①动… II. ①高…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20885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刘孝霞

助理编辑：罗泱慈

装帧设计：李婷婷 王鸣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57千字

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 高瑞泉

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始攻读中国哲学,1988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母校哲学系执教。曾在斯坦福大学等数所国外高校访学或兼任客座研究员。现兼任 *ECNU Review* (《华夏学术》) 主编,国际儒联理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副院长。著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从历史中发现价值》《平等观念史论略》等多种。

## 序

本书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尝试。跟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的“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sup>①</sup>即从 1914 年到 1991 年不到一百年有些类似，笔者在此处所说的 20 世纪，则可以谓之“伸头去尾的 20 世纪”；确切地说，本书研究的主要时段是从 1895 年到 1995 年的一百年。1895 年是中国现代思想激进化的开端，1995 年不但出现了若干重要的社会思潮转向的信号，而且海峡两岸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相继离世，堪称一个哲学世纪结束的标志。当然，哲学史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和思潮史，并非都可以因某个历史事件而完全框定。为了说明某些趋势或共性时，我常常不得不超出预定的时段，不过这种“超出”会是相当有限的。与一般着重于详尽地描述哲学史进程的著作有所不同，本书的宗旨是站在时代自我意识的高度，对现代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如何围绕着时代和社会的内在期待而展开的复杂历程，做出进一步的哲学反思；将中国哲学在近现代的演变，从“现代化取向”（冯友兰）、“政治革命—哲学革命”（冯契）等叙事方式做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注意如下问题：从前现代到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涉及我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样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不回应这一历史巨变所带来的挑战。以往人们注意到的历史

---

<sup>①</sup> [英]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马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

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甚至逻辑学，它们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涉及哲学变革的不同层面或某些视域。本人的工作则主要从社会哲学的视角集中考察 19 世纪末以来，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前辈和时贤做了何等有深度的思考并发生了什么样的论辩，同时探寻观念史的进程如何传达了文化精神的转向，考察它对于世人理解历史、认识今日中国的现实以及我们的未来，有何值得注重的意义。作者希望能够从社会哲学这一新的视角，开拓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新空间。这样的研究当然基于强烈的现实感：我们意识到，尽管“中国崛起”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但是贯穿近现代乃至当代将近一百八十年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并没有最终结束。

本书对自 19 世纪末以来有关中国哲学观念史的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哲学视角，其最初的焦点，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之“动力”的强烈追求，因而对于原先固有的秩序之态度以及秩序的基本原理之辩护也必定随之发生波动。

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以及从中央帝国突然被拖入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意识的危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1895 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可以成为 20 世纪中国思想主流激进化的起点：从社会史的视角看，正是由于 1894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严复、康有为等相继登场、危言高论惊动视听，原先在“中体西用”论的文化共识基础上儒家共同体所保持的社会团结，再也不能维系下去。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组成的儒家——士大夫共同体——分化了。它是 20 世纪之所以成为“革命世纪”的原因之一，也在观念世界开启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角关系。“救亡—富强”是当时中国人的共同追求，问题是：第一，如何达到富强？第二，中国需要何等样的富强？由此转到社会哲学的向度，第一个是“社会动力学”问题，追问如何获得“动力”；第二个是“社会静力学”问题，关系到“秩序”的基本原理。19 世纪末开始儒家知识共同体的解体，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在这两个问题上未达成基本的共识。

在“社会动力学”问题的论域中，现在的人们承认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重大作用。但是，在中国人普遍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前，甚至

在中国刚刚酝酿制度变革之际，知识精英的观念世界的变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化，预示着中国文化精神正在转向对动力性的追求。正是这一追求，成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导。它表示现实生活中对“富强”的追求，需要哲学的辩护。因此，对“动力”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内在期待。中国哲学有悠远的“变”的哲学，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既有儒家强调“生生之谓易”之“刚健”的一脉，也有与释道两家类似的另一种强势诠释，即以虚静为本体的哲学。古代哲学有繁复的“动静”“道器”“力命”之争，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积极应对时代的拷问，要从古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模式中转变出来，促成中国转变为足以与“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式的西方文明相竞争的现代社会。本书特别集中于研究从1895年到1995年这一百年间，因应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期待，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各派代表性人物如何提出理论主张、展开学术论辩，从而形成了一个观念史的脉络：在总的趋向上，适应社会急剧的变革要求，依托进化论广泛传播的文化背景，又经过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飞跃，前卫思想家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表明“动力的追寻”曾经是这个“革命世纪”的强主题；当然其中亦蕴含了“秩序的焦虑”或者“何谓秩序”的争执，但相对而言，“秩序”是个弱主题。这种状况到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了转向，它以“启蒙反思”为标志，与文化激进主义让位于文化保守主义相应的，是“动力的追寻”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后者迅速上升为时代的强主题。或者说，从1895年到1995年这一百年中，在较长的时段里，“动力的追寻”压倒了“秩序的焦虑”，而从20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在现代性批判中对“动力”之盲目性的清算，使得“秩序的重建”趋向于将“动力的反省”综合于其自身。

“动力的追寻”改变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气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员、推动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或曰“中国崛起”，其作用可用“哲学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导”来比拟，因而居功至伟。在经过长期的曲折，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以后，人们将会认识到，20世纪发生的这场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不过，我们对这场“动力的追寻”决非无条件地加以肯定。这不但指对加入这场转变的各种理论的直接形态，我们需要一种批判工

作（譬如对进化论传播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意志论，等等）；而且指由于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对“动力”的追求，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本质上具有某种激进的气质，它与被哈列维视为“哲学激进主义”的功利主义，构成了某种谱系关系。以欲望的解放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在带来新型的人格理想的同时，也曾经使许多普通人经历了心灵失序的迷茫。现代中国由于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如何重建——而显得尤其严重。从前现代到现代，新的政治制度需要秩序原理为其做合法性辩护。如何安顿人的心灵、重塑社会秩序，这样的思考，虽然在“动力的追寻”呈现为主流时就已经存在，但就观念史而言，直到20世纪90年代激进主义让位于保守主义之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开始面临如何重塑世界秩序的问题时，“秩序”才真正成为思想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我们充分意识到，从历史的向度看，各派哲学的意见虽有派别的区分，但是在实际进程中又是有分有合。在看似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其实有某些“隐蔽的共识”；反过来，即使在总趋势上趋同的时刻，也不等于具体方案会始终雷同。从1895年开始形成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三角关系，以一种不稳定的组合方式，或隐或现地存在于革命世纪之始终。在哲学领域，一开始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哲学中有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实证主义的三大流派与其遥遥相对。无论是在“动力”问题，还是在“秩序”问题上，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案。

从严复（政治上有自由主义倾向、哲学上则受实证主义影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描绘一个“质力相推”的机械论宇宙观，并由“推天理以明人事”的方法来论证“进步”的信念，以及“竞争”和“创造”何以成为进步之动力和源泉。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缺乏“求道”的热情，对于他们而言，“道”既是一个动力性的观念，又包含了秩序的意蕴，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试图进一步论证“自由”和“理性”为秩序原理之所以然。

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作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

世界的活动，因而将社会革命视为最重要的“动力”，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它与通过认识论与历史观的辩证综合而成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相互映照之功；同时认为变动了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才是通达“大同”的道路，未来社会需要以“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为理想的秩序。

从“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立场演化而来的现代新儒家，以“返本开新”的姿态，主要从创造性地阐发传统的“心学”义理，来解决主体的能动性问题的。从梁漱溟的“意欲”论、熊十力的“心本论”到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他们实际上都主张彰明道德主体意识、安顿现代人的心灵，才可能——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开出”科学与民主，重建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

在处理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基于“平等”的激进主义的方案和实验；另一方面有更强调法治、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秩序，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方案，理性化（韦伯）和市民社会（黑格尔）受到关注。后者在接受外来的思想的同时，也渐渐倾向于传统的自然演变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哈耶克）。因而在经济起飞实现以后，以文化传统主义为特色的保守主义开始崛起，取代文化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他们的运思方向，是将社会秩序、文化的连续性、人的实存三者视为内在一体的。以现代新儒家为主体的人文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工作。在“秩序”建构上，虽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拒斥激进主义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自由主义视野中“秩序”的基础是“自由”和理性的多元竞争，保守主义认定“秩序”的基础是“权威”“等级”和“传统”。继（以港台新儒家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家之后，晚近崛起的“大陆新儒家”则从“心性儒学”转入“政治儒学”和“制度儒学”，表现出积极干预现实社会生活的姿态。从“革命世纪”一开始，未来世界的秩序就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导引，20世纪末在“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更积极地讨论世界秩序的重构，并开始思考：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新轴心时代”？在那样的时刻，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哲学的革命成果能够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在民族、国家之间纷争不断，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运动之间出现新的对抗等新形势

下，中国学者积极地从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使得基于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与“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统一的愿景，有可能达到融合。

上述三大思潮的互相交集和论辩，构成了贯穿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中极为丰富而重要的哲学内容。由于它们是在持续的争论中演变的，它也就表现出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在“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过程中，曲折地传达了时代精神。与那些专注于对重要哲学家个人思想的研究不同，本书注意对通俗哲学和学院哲学做辩证的综合。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更广泛地把握社会的精神现象，通过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如何围绕“动力”与“秩序”这一对观念而展开的历史做具体考察，提供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新视角，同时也对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推进提供某种个案。通过考察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考的内在联系，来讨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侧面，希望这样的工作对认识这个时代、认识我们自己、规划未来能够有所裨益。

笔者深知，这样一种以社会哲学为视角、通过描述从思潮到观念以及诸多观点的争论的图景来书写现代哲学史的工作，既然是尝试，就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与错漏，唯望方家不吝指正。

高瑞泉

己亥年大暑改定于沪西寓所

高瑞泉作品系列

《道方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  
转向（1895—1995）》

《观念史的视域及方法》

《波涌与洄澜——中国现代思想史札记》

《理智与自然》

出品人 / 刘广汉

责任编辑 / 刘孝霞 助理编辑 / 罗泱慈

装帧设计 / 李婷婷 王鸣豪

#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作为时代之自我理解的哲学史研究	1
第二节 中国现代哲学的书写方式	12
第三节 文化精神的历史性转向	23
第四节 观念史的社会哲学考察	41
第二章 救亡与求道	52
第一节 失序的危机与儒家的分化	52
第二节 “天演哲学”与中国道路的探寻	62
第三节 “不忍人之心”与大同世界	76
第四节 “仁以通为第一义”与“以心力挽劫运”	91
第三章 革命世纪的社会动力学	107
第一节 革命世纪	107
第二节 动力的追寻	116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	130
第四节 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线与秩序原理	153
第五节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	164

第四章 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 .....	191
第一节 从“意欲论”“心本论”到道德理想主义 .....	192
第二节 秩序的重建 .....	205
第三节 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 .....	224
第五章 后启蒙时期的理想世界 .....	247
第一节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	251
第二节 大陆新儒学：从心性儒学到政治儒学 .....	266
第三节 “主体性”及其分化与消隐 .....	275
第四节 重建“信德” .....	299
第五节 新轴心时代与世界秩序的重构 .....	325
征引文献举要 .....	337
索引 .....	345
后记 .....	359

## 第一章 导论

本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一项研究，主要从社会哲学的视角集中考察19世纪末以来，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前辈和时贤做了何等有深度的思考并发生了什么样的论辩，同时探寻相关观念史的进程如何传达了文化精神的转向，它对于世人理解历史、认识今日中国的现实以及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意义。作者并不志在撰写一部现代中国哲学的通史，但希望从社会哲学这一新的视角开拓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新空间。这与我们的哲学史观、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以及“社会哲学”的一般问题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有必要先做一点简要的论述。

### 第一节 作为时代之自我理解的哲学史研究

最近四十年来，作为现代学术形态之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总体上说收获甚丰。不过由于需要覆盖的历史之宏阔与思想之复杂，自然其进展就不易平衡。比较而言，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受到比较多的关注，因而曾经出现过一批力作，但是随着现代新儒家成为显学，该论域丰富多样的内容对学术界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学术风气的转移原是平常事情，正如章学诚所说：“夫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一时风尚，必有所偏。”（《文史通义·外篇

三·与钱献之书》)在众多学人将热情投注于古代儒学的环境下,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一转变时代以及哲学发展的历史,开拓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新境界,既为人们的哲学观所影响,也必然有方法论上可以反思的问题。

—

作为现代学术形态的中国哲学学科是20世纪建立起来的,尽管如果从《庄子·天下篇》算起,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反省可谓源远流长,不过真正的“中国哲学史”,是与现代学院体制下的学科分界联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标以“中国哲学史”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所作,因而包含了教科书的功能。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中国哲学史”的撰写承担着双重责任。它既要给予读者中国哲学三千年发展脉络的基本知识,又要启发读者追随前贤进达智慧之路,乃至在现代世界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幸运的是,从一开始,最重要也最著名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哲学家如胡适、冯友兰、冯契等的创作。哲学家的哲学不同、对哲学史著述的哲学自觉程度有异,其所撰写的哲学史之面貌也各有特色。除了这些差异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也大不相同。胡适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自然可以不论;冯友兰先生研究的重心在古代,近代的部分不但简单,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政治社会思想史”<sup>①</sup>,这样处理近现代中国哲学史,几乎成为一时风尚。至于特殊的语境如何限制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我们后面将有所讨论。不过,从主观角度检讨,它也与人们对哲学史著述的时代意义之理解有关。譬如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近代思想就其关系到现实而言有其重要性,但是就“纯哲学”的眼光看,似乎并无价值。至于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所写的“现代中国哲学史”,也许因为特殊的言说环境,似乎更没有在系统性上着意。域外的情况更是如此,且不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相当一批学者,尤其是海外的汉学家,比起中国的现代文学

---

<sup>①</sup>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自序》,《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

和政治思想而言，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很少进入他们的视野。换言之，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哲学就只是传统的儒释道。“文革”结束以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出现过崭新的面貌，甚至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究其原因，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迫切需要从鸦片战争以来 150 年的历史经验中寻找“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方案，也就是感受到了龚自珍所谓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下，许多原先由于意识形态禁忌而长久消失于人们视野的哲学家，重新开始了学术研究活动。按照“两军对阵”的方式来划界的教条主义做派被舍弃以后，“现代化”开始成为另一个坐标。“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中国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尽管在相当一批学者眼中，现代化以及围绕它出现的种种政治社会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重要性和广泛性，但是对于哲学家的哲学而言，似乎并非如此。如果不是说完全无关的话，至多也只是外在关系。

其实，时代与哲学之间，既有外在关系，又有内在关系。就最一般的意义说，所谓“外在关系”，是指相关的两项，不因为其关系项的改变而改变；所谓“内在关系”，则指相关的两项中的一项改变了，另一项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在我看来，只有综合外在和内在两层关系，才能如实把握时代与哲学的关系，把握时代的一般观念与哲学史的关系，把哲学史的研究视为探求时代精神的入门向导。

在西方哲学史上，大约黑格尔可以被归结为主张“内在关系”说一派，他如此界定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这多方面的全体都反映在哲学里面，以哲学作为它们单一的焦点，并作为这全体认知其自身的概念……由此可以推知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sup>①</sup>

---

<sup>①</sup>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3—64页。

就黑格尔本人的哲学史观而言，他还主张另一层意义的“内在关系”说，即把哲学史看成“绝对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所以是一个合乎逻辑、有规律的渐次推进的过程。用他的话说，就是“哲学史当然以自行发展的理性为目的，这并不是我们加进去的外来目的；这就是它本身的实质；这实质是个普遍的本源，表现为目的，各个个别的发展与形态都自动地与它相适应”<sup>①</sup>。因此，哲学史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都指向其最后也是最高阶段的目的。由此演化出哲学史研究中“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这当然是一种特别强烈的“内在关系”说，在黑格尔的庞大体系中，概念、范畴之间的辩证推进，要求合乎内在一致性，不妨说是第一序的“内在关系”；哲学史与社会历史生活的关系，则可以說是第二序的“内在关系”。

我们知道，哲学史要研究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强调思想及其论证的内在一致性，这当然是学术界的共识。它甚至扩大到思想史的研究，因此有阿瑟·O. 洛夫乔伊强调思想的“内在”理路，或者所谓“内在的辩证法的工作”：“始终必须承认的是哲学家们（甚至普通人）运用（do）理性，恰如一个思想者尾随另一个。他们推理的暂时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逻辑上有根据的且具有逻辑启发性的结果。”<sup>②</sup>

另一方面，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也很受后人的批评，譬如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说：“哲学史的发展，在某一些时期内，只能完全由内在联系去理解，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思想内在的必然性和‘事物的逻辑’去理解。”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与思维提供的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使得在哲学史研究中，“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同时说，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方法的一致，过于强调思想的必然性，阉割了历史的偶然性，哲学的发展“不是单独依靠‘人类’或者‘宇宙精神’的思维，而同样也依靠从事哲学思维的个人的思考、理智和感情的需要、未来先知的灵感以及倏忽的机智的闪光”。除了这种个人的因素以外，还有一种“来自文明史的因素”：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30页。

② [美] 阿瑟·O. 洛夫乔伊：《反思观念史》，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36页。